

● 民族传统体育 ●

从无拳到无武术：“武当无武术论”的历史源流考证

刘志豪¹, 杨 谦¹, 黄小斌¹, 刘文字¹, 刘文武²

(1.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体育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2;2.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围绕“武当无武术”的相关讨论,学界长期存在将具体拳种源流考证结论外推为整体武术否定判断的倾向。本文基于武术史与文献学视角,以唐豪关于张三丰、内家拳与太极拳源流的考证为切入点,结合近代以来相关拳学著述,对“武当无武术”的历史生成及学术演变过程进行考辨。研究认为:1)唐豪考证的核心在于否定“张三丰为内家拳始祖”的起源叙事,逻辑基础为史料证据不足,而非对武当武术实践形态的整体否定;2)“武当无武术”并非唐豪原始考证的直接结论,而是在祖师神话去合法化、拳种否定与武术整体概念混用,以及学术观点传播过程中过度引申等因素作用下的学术史现象;3)随着史料条件的变化,武当武术史研究应由祖师叙事转向拳种谱系构建,并强调史料挖掘整理的学术转化意义,同时关注武当武术在现代体育化过程中的结构重塑问题。

关键词: 武当武术;武当无拳论;张三丰;太极拳起源;武术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3X(2026)04-0113-06

DOI: 10.20185/j.cnki.1003-983X.2026.04.018

From “No Boxing” to “No Martial Arts”: A Historical and Source-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No Martial Arts at Wudang” Thesis

LIU Zhihao¹, YANG Qian¹, HUANG Xiaobin¹, LIU Wenyu¹, LIU Wenwu²

(1.Hubei University of Automotive Technology,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iyan Hubei, 442002; 2.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proposition of “no Wudang martial arts,” there has long existed a tendency to extrapolate conclusions derived from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specific boxing lineages into a generalized negation of Wudang martial arts as a whol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tial arts historiography and textual studies, this paper takes Tang Hao’s examination of Zhang Sanfeng, internal martial arts, and Taijiquan origins as its analytical entry point. Drawing on modern martial arts writings, it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intellectual evolution of the “no Wudang martial arts” thesi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1) Tang Hao’s core argument was directed at deconstructing the origin narrative of Zhang Sanfeng as the founder of internal martial arts, based on insufficient historical evidence, rather than a denial of Wudang martial practices per se; 2) the notion of “no Wudang martial arts” does not constitute Tang Hao’s original conclusion, but rather emerges as an academic construct shaped by the delegitimization of patriarchal myth, the conflation of lineage-specific negation with the broader concept of martial arts, and the overextension of scholarly arguments during their transmission; 3) with the evolution of available historical sources, research on Wudang martial arts should shift from patriarch-centered narrative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neage genealogies, emphasizing the scholarly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le also addressing the structural reconfiguration of Wudang martial arts with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sportization.

Keywords: Wudang martial arts; “no boxing at Wudang” thesis; Zhang Sanfeng; origins of Taijiquan; martial arts historiography

收稿日期:2026-03-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5BTY034);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BK202571)。

第一作者简介:刘志豪(1992~),男,河南周口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武术历史与文化。

通信作者简介:刘文武(1982~),男,山东济南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武术基本理论,E-mail:liuwenwu1982@126.com。

武当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不仅在中国武术谱系建构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且在国家文化形象塑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中被赋予高度象征意义。199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006年,武当武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而在武术界,无论是“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盛誉,还是“外家刚猛”与“内家柔化”的文化叙事结构,武当均被赋予超越拳种层面的文化象征意义^[3]。然而,与其在文化象征

层面所获得高度认可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近代以来学界在武当武术历史真实性与拳种存在问题上的讨论,却逐渐生成并固化为“武当无拳论”^[4],并在后续研究与传播中被进一步引申为“武当无武术”^[5]的学术判断。这一判断不仅深刻影响了武当武术的学术认知框架,也在近代武术史研究中固化了关于“武当武术是否存在”的叙事。

从学术史脉络看,“武当无武术”相关论断通常被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唐豪在《少林武当考》《太极拳与内家拳》中对张三丰、内家拳及太极拳源流问题的考证^[6]。通过引用“张三丰并不娴技击也”,张三丰创拳创派系后人“层累地编造”等观点,使人们对张三丰其人、张三丰是否创立武当武术、武当是否有拳等问题产生疑问^[7]。此后,一些研究在转述与概括过程中,将唐豪对具体历史的考证,引用为“武当无拳”^[8]的结论,甚至进一步演绎为“武当山没有武术”^[9]的判断。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指出,“谈及武当拳派有个问题需要辨明,近来一些论者动辄批驳唐豪的所谓武当无拳论,但只要认真读过唐先生文章,是难以苟同这一指责的”^[10]。

由此产生以下问题:1)唐豪在太极拳源流考证中是否提出“武当无拳”的结论;2)“武当无拳”如何演变为“武当无武术”的学术结论。基于此,本文以唐豪相关考证文本为基础,并结合湖北省1983—1986年系统挖掘整理的武当史料,从武术史研究视角出发,对“武当无武术”相关论断进行史料溯源与学术史分析,旨在厘清唐豪考证的学术边界,揭示相关判断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并为武当武术史在新史料条件下的再诠释与重构提供理论依据。

1 “武当无武术”的历史考察

1.1 张三丰与太极拳:祖师叙事的史料基础

在唐豪对武当太极拳展开系统考证之前,内家拳与太极拳习练者多奉张三丰为祖师,相关研究指出,明清之后的武林,多称张三丰为武当内家拳、太极拳创始人^[11]。早期太极拳著述如《太极拳体用全书》《太极正宗》及《武当赵堡太极拳小架》等,均在历史溯源中将张三丰奉为祖师。

从史料类型看,关于张三丰祖师叙事文献可分为3类。其一,正史与道教文献。这类文献主要塑造张三丰作为得道高士与异人的形象,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与颂扬意味。《明史·方伎传》强调其“不饰边幅”,并描绘其外貌特征,“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12];《道统源流》《道藏辑要》等文献亦多记录其修道经历与神异事迹。从史料形态看,尽管此类文献中偶有“善剑”“拳技”等表述,但并未涉及拳法名称、技术结构、练习体系或明确传承谱系,难以据此建立其与具体拳种之间的历史关联。其二,地方志与文人题咏,《大邑县志》《邓州志》以及《大岳太和山纪略》等文献,多以“拳力过人”“善骑射”^[13]“剑光潇洒”等语汇描述张三丰的武艺能力。同时,张三丰自作《刀尺赋》及田雯《古欢堂集》中的《三丰道人壁影歌》等文本,亦以象征化语言呈现其导引养生与修道形象。这类文献更多体现的是地方记忆与文人修辞,其所指向的“能武”“善技”,多表现为身体能力或修炼象征,而非对某一具体拳种创立事实的历史证明。其三,明末清初以来拳学与理论著述,主要出现在“文人入武”的历史语境中,并在此阶段首次将张三丰与“内家拳”进

行直接关联。《王征南墓志铭》中“少林为外家,武当为内家”的二分文化结构,将“内家拳”追溯至宋之张三丰,由此奠定其作为“内家拳祖师”的文献基础。黄百家在《内家拳法》中进一步发展该说法,提出张三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14]。此后,王士禛等文人在诗文与随笔中不断强化“少林与武当”“外家与内家”的二分文化结构,使张三丰祖师形象在拳学叙事与大众认知中逐渐固化。可见,现有文献虽然普遍将张三丰塑造成“能武”“善技”之人,但这种叙事更多停留在象征性与观念性层面,尚不足以据此论证其创立某一具体拳种,更无法直接确认其与太极拳之间存在明确而连续的技术传承关系。

1.2 唐豪考证:太极拳源流问题的史料辨析

近代以来围绕王征南内家拳法与太极拳关系的讨论,学界多以唐豪在《少林武当考》《太极拳与内家拳》及《唐豪太极拳少林考》中的考证为主要依据。通过对这些文本的整理发现,这一考证的核心观点也并不在于简单否定某一人物祖师地位,而在于通过史料学论证方法,剥离武当与张三丰叙事中的神话成分,重建太极拳起源问题的历史讨论边界。

首先,唐豪通过梳理武当山山名演变过程,指出“武当”并非山名之原初称谓,而是在宗教叙事中逐步形成的结果。《方輿胜览》《水经·沔水注》《輿地纪胜》《湖广通志·山川考》《襄阳府志》等文献所载“太和”^[15-17]“仙室”^[18]“大岳”^[19]等名称,显示出武当山名的多重性与历史生成性。至元明以后,《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中,玄武神得道其中,改号武当,谓非玄武不足当此山也^[20];及《大岳太和山纪略·武当五龙灵应碑》中,“相传元天之气之神,当轩辕氏时,震夙净乐国王家,乳于母之胁左”^[21]等文本,进一步将武当与玄武得道的神话叙事紧密结合,使其成为具有强烈宗教象征意义的名称。可见,武当在语义层面已转化为一种神话文化中的宗教符号,这一判断也为其后续否定“祖师神话”考证奠定了基础。

其次,围绕“张三丰是否为内家拳祖师”问题,唐豪从史料可靠性与叙事逻辑两个层面提出质疑。一方面,关于张三丰“善武”及明太祖、明成祖寻访张三丰的相关记载,多在民间传播中被不断神话化,其现实动因与政治背景在后世叙事中被遮蔽。而皇帝之尊,派遣大臣,奔走于州、郡、乡、邑之间,以求一道人,民间安得不色然相告语曰:仙人、仙人。后又据史指出,当时仅有《太岳太和山志》中一处谈武当“拳棒”故实者,而张三丰也并“不娴技击”。另一方面,对于《王征南墓志铭》中“内家拳之说,起于宋之张三丰”的表述,唐豪从文体性质与写作情境出发,指出该文为应酬性墓志,内容多沿袭传说而成。如《王征南墓志铭》是高辰四请求黄宗羲代为撰写,写作过程中多“依样葫芦”,即便黄宗羲本人亦“未遑考其出处”。其“梦中得授拳法”“单丁杀百寇”等情节明显荒诞,难以作为史实依据,并明确提出“若欲据为史实,以三丰为内家之祖,窃未以为可”^[22]。在否定张三丰作为内家拳祖师的基础上,其又进一步将考证推进至“太极拳是否属于王征南内家拳体系”的问题。其通过拳法传承与技术结构的比较方法,对内家拳六路、十段锦与太极拳在“打法、练法与歌诀表述”等方面进行系统比勘。结果显示,内家拳以“长拳滚斫、分心十字、摆肘逼门”等技法为核心,而太极拳则形成以“棚、捋、挤、按、采”等为代表的技法体系;内家拳记载练法中手法三十五、练步十八,与杨(露禅)派、孙(禄堂)派、吴(鉴泉)派等太极拳体系所传不相同;在

术语与歌诀层面,二者亦缺乏一致性。由此,现有文献与技术材料均不足以证明,太极拳与王征南内家拳之间存在直接、连续的传承关系,而将二者简单等同,属于“牵强附会”^[23]。

最后,唐豪在剥离陈卜祖师叙事后,提出太极拳之祖为明末清初陈王廷的结论。针对陈卜创太极拳之说,“以阴阳开合运转周身者……,故名曰太极拳”^[24]。唐豪通过对陈卜墓碑与族谱的考证指出,该说法既无碑刻佐证,亦不见于早期文献,实为后人附会,不足采信。相较之下,关于陈王廷的史料则具备相对明确的文献支持,其遗诗中“闷来时造拳”的自述,《陈氏家谱》中对其拳艺创制的记载,以及陈家沟长期传习“太极十三势”与“炮捶”的村落实践事实,均构成太极拳形成的重要史证^[25]。同时,太极拳谱中“长拳”“十三势”等内容与戚继光《拳经》之间在技法名称与结构上的承袭关系,也进一步确定了太极拳形成时间不早于戚继光。综上所述,陈王廷在时间与史料条件上均与太极拳的形成更为契合,应推为太极拳之祖。

1.3 唐豪考证结论的外推:从无拳到无武术

唐豪关于张三丰、内家拳与太极拳的考证,其研究对象始终限定于“人物→拳种→源流”的层级,并未触及“武当是否存在武术活动”这一整体性命题。然而,在后续研究与知识传播过程中,其考证结论却经过概念外推与判断转移,被引申为“武当无武术”的整体性否定结论。

第一层外推,是“人物→始祖”判断向“拳种存在”判断的转移。唐豪通过对“武当山→张三丰→王征南内家拳→太极拳”关系的系统考证,否定张三丰作为内家拳与太极拳祖师的神话叙事,并在此基础上认定陈王廷更符合太极拳创制的史料条件^[26]。这一结论的学术指向,是对特定起源叙事的去合法化,而非对武当地区武术活动的整体否定。然而,在部分研究者对唐豪观点的概括性转述中,这一“否定张三丰为始祖”的史料判断,被引申为“武当无拳”考证结论^[27],从而完成由“人物判断”向“拳种存在判断”的首次跃迁。第二层外推,则体现在“拳种→存在”判断向“区域整体”判断的扩展。关于这种学术文化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中已有体现。《武当拳之研究·武当拳派之渊源》中明确指出,唐豪否定张三丰为内家拳始祖的考证,已被部分研究者进一步引申为“武当无拳”论^[28]。在这一过程中,原本针对特定拳派的史料判断,被悄然转化为关于武当地区是否存在拳派传统的本体性判断,其论证对象与逻辑层级已发生实质性变化。第三层外推,将“武当无拳”引申为“武当无武术”的整体性结论。这一阶段概念的放大,已明显脱离唐豪原始考证的论证范围,多发生在教材编写、武术史著作及学术论文等二次知识生产环节之中。在此语境下,唐豪的史料考证被反复过度引申,其否定性结论被重新转述为整体判断的结论,即所谓“唐豪考证,武当山无武术”。正是在这一层层简化与概念外推的过程中,“武当无武术”“武当武术仅为神话叙事”^[9]等说法开始出现,并在相关研究中被再次转述与引用。

从史学考证的梳理来看,上述结论并非唐豪研究的原始指向,而是学术结论传播中的再生产。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在理解与引用唐豪相关结论时,有必要重新回到其研究对象与方法边界,区分“起源考证”“拳派判断”与“区域武术存在问题”之间的不同逻辑层级,以避免学术结论在概念外推中被过度放大。

2 “武当无武术”的发展辨析

2.1 祖师神话去合法化与武术体系的逻辑区分

在中国武术史的书写传统中,“祖师神话”长期承担着为特定武术传统提供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叙事功能,但这一叙事层级若不加区分,极易在研究中被误读为对武术实践本身的历史判定。因此,祖师叙事的去神话化处理,属于史料层面真实性辨析,其否定对象是神话叙事的历史可靠性,而非武术作为身体实践与文化传统的整体存在。

从武术史的溯源视角看,无论是少林武术所依托的“达摩”^[29]叙事,还是武当武术所关联的“张三丰”传说,抑或峨眉武术中“司徒玄空”^[30]的叙事,其核心意义并不在于提供可供验证的历史事实,而在于通过人格化与神圣化方式,将技艺传承、宗教观念与价值伦理整合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谱系。这类祖师叙事本质上属于一种象征性谱系建构,在于整合技艺传承、宗教观念与价值伦理^[31]。在此意义上,祖师神话应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叙事资源,而非直接的历史事实来源。以少林武术研究为例,传统叙事中长期奉达摩为少林武学之祖,并以《易筋经》作为武学体系的经典之作。针对这一“祖师→经典→武学体系”的建构模式,唐豪通过文本比勘与文献源流分析指出,《易筋经》序文中关于达摩授拳的叙述,其语言风格与叙事结构明显脱化自《景德传灯录》,不具备同时代文献应有的原生特征,由此明确判断该序“定系后人伪托无疑”^[32],并进一步否定《易筋经》为达摩所作。也由此可知,这一考证结论是建立在文献考证上的祖师神话否定,而非对少林武术整体性否定。

同样,该逻辑亦适用于张三丰与武当武术的关系。唐豪通过史料考证否定张三丰作为内家拳创始人的真实性,其批判对象明确指向“祖师与拳种”之间的神话化关联,而非武当地区是否存在武术活动这一更为宽泛的问题。当然,关于唐豪这种考证方式也有不同的观点指出,这种对武当武术与张三丰关系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信史”为中心的实证主义史学范式对史料的筛选标准。在该方法框架下,宗教叙事、传说文本及相关仪式实践因缺乏文献确证而被排除在有效史料之外,从而在研究中形成对相关历史资源的结构性忽视^[33]。而从综合比较的视角看,“达摩→少林”与“张三丰→武当”在叙事结构、宗教背景与文化功能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二者皆是在后世附会与层累建构中形成的祖师神话。若否定达摩并不等同于否定少林武术,那么在逻辑上,否定张三丰亦不应被理解为对武当武术的整体否定。因此,在武术史研究中,有必要将“祖师神话的合法性叙事”与“武术体系的历史存在”加以区分。祖师神话可以被去神话化,但武术体系仍需在新的史料条件与研究视角下加以重构;通过完成这一逻辑区分,避免将叙事层级的否定,误读为对武术体系整体的历史否定。

2.2 拳种否定与武术整体否定之间的概念错位

在武术史研究中,若未对研究对象的概念层级加以严格区分,便出现将针对具体拳派的史料否定,被误读为武术整体流派历史存在的否定。这种概念错位,是近代以来“武当无武术”等争议性判断,得以生成并扩散的重要问题根源。而从武术基础理论视角来看,“武术”作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涵盖多种身体实践形态的上位概念,其内容

既包括套路运动中的拳术、刀、枪、剑、棍等单人或对练形式,也包括散手、推手、长兵、短兵等对抗性项目^[34]。相较之下,无论是王征南内家拳法,还是太极拳,均仅属于地域武术体系中的具体拳派^[35],在概念层级、历史生成路径与研究范围上,均无法与“武术”这一整体概念等同。若在论证中忽视这一基本区分,便会在逻辑上导致研究对象的层级错置。

这种错位在近代武术史书写与传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太极拳因其独特的动作表现、哲学阐释与养生功能,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赋予“内家拳法”“张三丰”等高度凝练的文化符号,从而在大众认知中获得超出单一拳种的象征地位。正如唐豪所言,“近人著作,每言太极拳为张三丰所创”,这一现象本身也反映了文化叙事对拳种源流认知的深度塑形。另一方面,在“道门秘传”^[36]的叙事框架下,太极拳又被逐渐等同为王征南内家拳,进而被视为武当武术的集中体现,甚至被代表为武当武术本身。这种过度代表化,使得太极拳在逻辑上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其自身的整体性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武当武术长期被视为“隐秘传承”的认知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上述概念错位。直至1984年在承德召开的“全国武术挖掘工作成果汇报会”上,湖北省首次系统公布武当拳8种^[37],武当武术拳种才逐步进入公共学术视野。同样,在山西太原全国武术观摩大会上,武当太乙五行拳的公开展示,也成为反驳“武当无拳论”的重要实践证据^[38]。在此之前,由于史料匮乏与传播受限,太极拳往往被默认为理解武当武术的主要甚至唯一窗口,这也进一步放大了“以一拳代整体”的认知偏差。

因此,围绕武当武术与太极拳关系的讨论,必须在区分上位与下位概念的前提下展开。对太极拳源流的史料辨伪,属于对具体拳种传承脉络的历史考证,其研究指向并不构成对武当武术整体存在与否的判断前提。也只有在概念层级得到澄清的基础上,相关学术结论方能被准确理解与合理引用,避免在传播过程中被误读为武当武术整体传统的否定。正如唐豪在《太极拳与内家拳·自序》中所言,作此书“主要目的,在辟太极拳之妖妄”,而非对武术本身持否定立场。这一表述,恰可作为理解相关争议的关键注脚。

2.3 学术观点演变与史料条件变化的错位解读

在武术拳种源流历史考察中,史料论证并非一次性完成的终极判断,而是一种具有阶段性与开放性的学术过程。任何基于特定史料条件所形成的研究结论,都应被理解为在既有证据体系时作出的暂定性判断,而非不可修正的历史定论。“典范历史”并不必然等同于“最真实的过去”,其之所以成为主流叙事,往往源于其更符合特定时代的知识结构与现实需求,或更能回应当下社会对历史意义的期待^[39]。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唐豪基于当时的史料条件,对张三丰、内家拳与太极拳源流问题所展开的系统考证,应被视为其时代学术条件下的重要推进,而非相关问题的最终结论。这一点亦可从唐豪本人“吾相信本书是推进武术于创造进化这条路上的必要工作”这一表述中得到印证。

对唐豪学术成果的合理继承,关键不在于对其具体结论的简单重复,而在于延续其问题意识与据史考证的方法论。在武当武术与太极拳源流问题的研究中,后续学界对其结论的不同引申,更多体现为学术传播过程中的简化机制,而非研究

者的原始结论。一方面,唐豪基于史料匮乏所作出的否定性判断,在部分转述中被理解为对相关历史现象的全面否认;另一方面,其研究所针对的特定拳种、特定起源叙事的论证边界,在多层级引申与概括过程中逐渐被弱化甚至抹除。此外,武当武术长期被视为“道门秘传”;相关拳种的挖掘整理与系统呈现起步较晚,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史料供给与学术判断之间的不平衡。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原本谨慎而有限的史料结论,容易在传播中被重构为排他性的判断,从而引发“以唐豪之名否定武当武术整体性存在”的结论取向。

对唐豪观点的合理继承,应体现在延续其问题意识与据史考证的方法论原则之上。而在武当与太极拳源流的探讨中,其考证结论被不同层级的引申,更多源于学术传播中的简化机制,而非研究者的主观否定意图。因此,武当武术史的研究应从“辨伪”走向“修正”,这既是对其考证研究精神的继承,也是推动武当武术持续深化研究的必由之路。

3 “武当无武术”的史学反思

从史学角度看,“武当无武术”并非单一史料判断的结果,而是多重研究范式、史料条件与知识传播机制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学术现象。近代以来,武当武术研究在“史料匮乏”的前提下启动,其研究对象在学术分工与理论建构中逐步被边缘化,继而在主流叙事中呈现为“不可见”的对象,最终在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被过度引申为“不存在”的研究结论。由此生成的“武当无拳”乃至“武当无武术”判断,其问题并不止于结论正误,而在于史学叙事范式、史料转化机制与现实结构之间的系统性错位。因此,对“武当无武术”问题的反思,亟需超越单纯的史料辨伪或立场申辩,而应从叙事范式、史料条件与现实结构3个层级,对这一学术现象进行回应。

3.1 叙事范式:祖师中心到拳种谱系建构

传统武术史叙事往往以祖师人物为中心,通过单线溯源方式解释拳种起源与合法性来源。这一叙事方式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其主要功能在于强化群体认同、建构价值象征与维系传承秩序,但其所提供的更多是象征性意义与合法性地位,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史或实践史证据。在史料考证语境中,一旦祖师神话因证据不足而被去合法化,若仍固守“祖师与拳种”一一对应的解释框架,便极易产生逻辑滑移,即由“祖师不可证”推导出“拳种不存在”,进而演化为“无拳”乃至“无武术”的判断。因此,从拳种本体出发,对其技术形态、结构特征、演变路径及谱系关系进行系统梳理,构成避免因祖师叙事失效而否定整体武术体系的必要前提。在实践与体系建构层面,武当武术拳种谱系的形成,不应局限于既有挖掘整理中所确认的有限拳种。而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吸纳历史上与武当存在文化关联或技术互动的地域性拳种资源。历史经验表明,武当武术并非封闭系统,其传播与演化过程本身即伴随着跨区域流动与再整合的特征。如宋唯一的《武当剑谱》^[40],以及金子戩的《武当太乙五行擒扑二十三式》,后被整理成《武当太乙五行拳》重新纳入武当武术谱系之中^[41]。类似逻辑也见于少林武术的近现代建构过程。1928年少林寺遭战火毁损后,原有拳谱与文献大量散佚,后经对各地回流少林拳的系统搜集与整合,逐步形成相对完整的拳种谱系结构^[42]。这一过程并未因

祖师叙事的去神话化,而否定少林武术的整体存在,反而为其技术史与实践研究奠定更为稳固的基础。故而,武当武术同样可以借鉴这一成功案例,围绕武当武术文化认同与技术特征,对相关拳种进行再考证、再归类与再整合。

通过这种“回流→整理→谱系化”的研究路径,武当武术得以从祖师合法性叙事中解放出来,被重新置入以拳种为单位的实践史与技术史框架之中。这一转向不仅有助于在学理层面回应“武当无拳论”的质疑,也可以推动武当武术史研究由象征性叙事向结构性建构的范式转型,并为后续研究与实践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3.2 史料条件:挖掘整理与学术转化

“武当无拳论”之所以得以产生并在较长时期内被反复引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武当武术历史文献长期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在近代武术史研究初期,学界可利用的武当武术史料数量有限、类型单一,尚不足以支撑对拳种谱系、技术形态及其实践的系统论证。在这种史料匮乏条件下,唐豪围绕张三丰、内家拳与太极拳源流问题所展开的考证,以“证据不足”为逻辑前提,其否定性判断具有明确的时代语境与史料边界背景。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范围内武术挖掘整理工作的开展,武当武术相关史料在数量与类型上均发生显著变化。地方志续修、拳谱整理、拳种调查、实践记录及口述资料等新史料的出现,客观上已构成一个不同于唐豪时代的史料环境。按照《武当内家拳法汇宗》中的说法,武当武术已经陆续挖掘整理出29个门派和223套功法^[43]。然而,从学术史角度看,这一阶段性成果并未得到充分的学术转化,相关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主要停留在对既有结论的重复引述之中,缺乏在新史料条件下的再讨论与再推进,由此形成“史料条件已变,而学术结论未变”的研究滞后现象。这一学术现象,已反映在相关研究与工具性书籍文献的编撰中。在现代出版的《中国武术史》(1997)《中国武术百科全书》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等权威著作中,均未将武当武术列入既定分类体系之中,客观上进一步固化“武当武术不可定位”的学术印象^[44]。在这一过程中,武当武术并非因缺乏现实传承而“消失”,而是因史料转化与理论吸纳机制的滞后,在学术叙事中被置于一种“不可见”的状态。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学术结论并非不可调整。随着近年来武术史研究的推进,部分权威著作已开始对既有拳种流派分类框架作出修正。在《中国武术史》(2019)中,拳种流派的划分出现了“南拳”“北拳”,并明确将“少林、武当、峨眉”^[44]等作为重要流派加以讨论,这也标志着学界已在新的史料条件下对相关问题做出回应。

基于此,有必要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当武术挖掘整理成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史料库重新加以评估。这一工作不仅涵盖新修《武当山志·武术卷》《武当纯阳拳》等正式出版文献^[45],还应进一步拓展至拳谱抄本、传承谱系记录、影像资料以及系统的口述史材料采集。通过对不同类型史料进行分类、比勘与校证,逐步建立结构清晰、来源可溯、可供反复验证的武当武术史料文献库,使散乱挖掘成果转化为具有学术稳定性的研究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将上述史料系统纳入武术史与武当武术史的叙述框架之中,使相关研究从早期“史料匮乏条件下的辨伪”,转向“新史料条件下的再解释与再建构”。这一转向,并

非对唐豪考证结论的否定,而是在其史料方法论精神基础上的历史延伸。

3.3 现实回应:体育化进程中结构重塑

从史学反思角度看,围绕“武当无武术”的相关争议,其问题并不止于史料与叙事层面的解释失衡,也与武当武术在现代体育体系中长期处于制度性“不可见”状态密切相关。在这一意义上,推进武当武术的体育化进程,并非单纯的现实发展策略,而是一种通过技术标准与制度体系重塑其学术与社会可见性的路径。

此处所指的“体育化”,并非简单的竞技化或表演化,而是通过技术标准与制度体系建构,使武当武术具备可教学、可考核、可传播的现代体育形态。在技术层面,武当武术的标准化工作已具备一定基础。自2015年启动的“两拳一械”技术编创工程,历时七年,完成了动作体系的系统整编与专家论证评审,在一定程度上为武当武术规范化教学与推广提供了技术依据^[46]。这一成果表明,武当武术并非缺乏可操作的技术内容,而是在较长时期内未能形成统一、权威的技术标准体系。相较之下,在制度层面,武当武术仍明显滞后于全国武术发展的整体进程。自1998年武术段位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来,段位制度已成为衡量拳种体系化与规范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而迄今为止,武当武术尚未建立起独立、完整的段位制评价体系,其在教学认证、人才培养及社会传播层面亦缺乏制度支撑^[47]。这种结构制度缺失,使武当武术即便具备现实传承与技术内容,也难以在现代体育竞赛与学术体系中获得高度认可。对比而言,少林武术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正是通过竞赛体系的构建、段位制度的实施以及配套教材的出版,逐步完成了从地域性武术向全国性体育项目的制度转化^[48]。这一拳种武术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一种武术技术形态被纳入明确的技术标准与制度框架之中,便可逐步走向持续与稳定的发展轨道。

因此,推动武当武术的体育化发展,应在既有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同步推进段位制度等配套体系建设,使其在技术标准与制度规范两个层面形成协同机制。同时,应注意“标准化”与“科学化”路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传统武术与身体经验的内在关联,进而引发文化内涵的弱化问题。应在武当武术现代转化过程中,重视身体经验的再嵌入机制,以维系其文化内涵的连续性^[49]。继而通过这种结构性重塑,使武当武术逐步从长期“制度性不可见”的状态中走出,在现代体育体系与学术研究中获得高度认可。

4 结语

唐豪关于张三丰、内家拳与太极拳源流问题的考证,其核心在于基于史料证据不足,对特定祖师叙事与起源范式作出否定性判断,并未提出“武当无拳”或“武当无武术”的结论。从武术史研究的视角来看,“武当无武术论”的生成亦非单一史料判断所致,而是祖师中心叙事惯性、史料条件约束与知识传播简化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武当无武术论”的回应,不应停留于结论层面的正误辨析,而应回归其生成语境与知识建构机制,从拳种谱系建构与史料挖掘整理的学术转化出发,结合武当武术现代体育化进程中的结构重塑,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 [1] 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公报(2012年第17号)[EB/OL].(2012-09-01)[2026-01-24].http://www.hubei.gov.cn/xxgk/gb/201209/t20120913_1754968.shtml.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EB/OL].(2006-06-02)[2026-01-24].https://www.gov.cn/jwqk/2006-06/02/content_297946.htm.
- [3] 曾帅,雷学会,龙行年.武当武术资源开发路径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9,53(4):60-65.
- [4] 甘毅臻,张明义.武当武术的分类刍议[J].南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7(2):12-14.
- [5] 陈姗,王飞,张俊杰.武当武术的历史境遇与当代发展之思[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5):63-67.
- [6] 李艳勤,张玻源,马世坤.中国武当武术文化传承研究:以武当拳为例[J].武术研究,2024,9(8):49-53.
- [7] 龙行年.武当武术文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1.
- [8] 赵歆.从文化视角探讨武当武术的必要性[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1,45(10):80-82.
- [9] 甘毅臻.民国时期武当武术发展概况研究[J].武术研究,2024,9(9):5-8+36.
- [10] 周伟良.武当道教文化影响下的一个文化案例:基于武当武术的历史梳理[J].中华武术(研究),2013,2(1):6-15.
- [11] 杨立志.武当文化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1.
- [12]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7641.
- [13] 四川省大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清乾隆《大邑县志》校注[M].成都:成都温江耀麟印刷厂,1998:146.
- [14] 周伟良.浙东内家拳历史源流考[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2(6):108-113.
- [15] 祝穆.方輿胜览(中册)卷三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3:594.
- [16] 酈道元.水经注·沔水二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2020:8275.
- [17]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五[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2115.
- [18] 课题组.天下太极出武当:太极拳与武当山关系考察[J].武当,2008(11):3-54.
- [19]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中国名山志·大岳太和山志[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158.
- [20]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M].扬州:广陵出版社,2011:9880.
- [21] 中国武当山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579.
- [22] 唐豪.少林武当考[M].南京:中央国术馆,1930:77.
- [23] 洪浩,梁宇坤,张三丰创太极拳说考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49(3):46-52.
- [24] 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9.
- [25] 唐豪.太极拳研究[M].3版.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3.
- [26] 唐豪.行健斋随笔,唐豪太极少林考[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83.
- [27] 曾帅,王圣焘,雷学会,等.内丹哲学:武当武术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与转向[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4,58(5):59-65.
- [28] 江百龙.武当拳之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2:51.
- [29] 曹佩芳,陈超.少林武术技击思想的演变及文化诠释[J].湖北体育科技,2013,32(6):526-528.
- [30] 丁心怡.峨眉武术器械的传承困境与发展路径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23.
- [31] 周伟良.试论武当太极信仰的文化成因:兼论张三丰与武当内家拳[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5,42(3):257-274.
- [32] 唐豪.少林武当考,太极拳与内家拳,内家拳[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99.
- [33] 曾帅,姚荣奇,邵艳艳,等.我国传统武术“内外分野”民间信仰生成的内丹学阐释:以武当武术文化为中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6,60(2):61-68+85.
- [34] 中国武术大辞典编辑委员会.中国武术大辞典[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1.
- [35] 中国武术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武术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90.
- [36] 时保平.武当武术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5(4):83-86.
- [37] 湖北体委武术挖掘整理组.湖北体育史料·武术专辑[M].武汉:湖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1986:1.
- [38] 魏小双.武当武术原生态价值取向与传承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2020.
- [39] 薛浩,郑国华,喻和文.从叙事史到结构史:近代以来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反思与转向[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46(9):73-89.
- [40] 周伟良.武当武术的历史梳理:道教影响下的一个文化案例[J].学术界,2013(10):198-207.
- [41] 龙行年.武当武术研究综述[J].体育文化导刊,2011(1):131-135.
- [42] 陆饰涵,谢岗龙,马杰威.从传统到现代:近百年少林武术图书的发展历程分析[J].武术研究,2024,9(4):19-22.
- [43] 李发平,刘洪耀.武当内家拳法汇宗[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
- [44] 郭玉成.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283.
- [45] 湖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湖北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4:185.
- [46] 徐刚,黄亚琳,范学锋.《“两拳一械”竞赛套路》教材发行仪式在武当山举行[J].武当,2024(1):28-29.
- [47] 李也许.制度文化视阈下武当武术段位制构建的理论基础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2022.
- [48]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少林拳[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
- [49] 江松,侯小琴.传统武术图腾隐喻与身体实践[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5,59(6):65-72.